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政府治理能力与公众社会安全感 ——基于 GSSCH2020 数据的门槛效应分析

郭未 马炬申

摘要：基于 2020 湖北省疫后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本文在社会认知理论视野下，以“熵权 TOPSIS 法”测度湖北省各地市的政府治理能力，并采用 OLS、工具变量法以及门槛效应模型（Threshold effect model）深入分析政府治理能力对公众社会安全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湖北省各市的政府治理能力存在量上的“一超多强”和空间上的异质分化特征。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对属地公众的社会安全感具备显著促进作用，但是这种影响整体上呈现出非线性的门槛效应。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影响公众社会安全感知存在单门槛效应，在突破门槛阈值后对公众社会安全感的提升作用则大大减弱，这意味着具备高水平政府治理能力的城市进一步提升公众社会

①作者简介：

郭未，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人口、环境、技术与社会（PETS），人口变化与公共健康（PDPH），城镇化、健康与福祉（UHW）。weiguo@nju.edu.cn。

马炬申，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变化与公共健康（PDPH）。majushen@yeah.net。

基金项目：

本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研究专项项目“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网络社会心态及公众情绪引导研究”（项目编号：20VYJ039）的阶段性成果。

安全感面临更大挑战。同时，这种影响具备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相较于农村，政府治理能力对城市公众社会安全感有着更大的边际效应。本研究认为，公共风险的常发性表明当下中国已具备风险社会的特质，因此，政府理应进一步促进自身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转型，通过打造服务型政府，着重提升城市的管理水平和行政效率，关注“一老一小”和“低收入、低学历”群体的社会安全感缺失问题，更积极有为地应对未知社会突发事件。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治理能力；社会安全感；新冠肺炎疫情；
门槛效应

Government's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Residents' Sense of Social Security in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Threshold Regression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2020 General Social Survey on COVID-19 in Hubei, China

Wei GUO, Jushen M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2020 General Social Survey on COVID-19 in Hubei, China*, this paper uses the TOPSIS entropy weight method to measure the government's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of all prefectural level cities in Hubei Province, and uses OLS, IV estimation, and the threshold effect model to deeply analyse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s governance capacity on the public's sense of social secu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gnition theory. The study has quantified spatiotemporal heterogeneity of government's governance capacity across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Hubei Province. The local government's governance capacity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public's sense of social security, but this influence has presented a non-linear threshold effect as a whole. When the local government's governance capacity has broken through the low threshold, the effect of improving the public's social security would be significantly enhanced, but after breaking the high threshold, the effect of improving the public's social security would be greatly weakened. At the same time, this effect has obviou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compared with rural areas, government's governance capacity has a greater

marginal effect on the public's sense of social security in urban areas.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public risks indicates that China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a risk society at present.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further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its own governance capacity,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 the supply of “one old and one small” services, and pay attention to the lack of social security of the groups with low income and education to proactively respond to unknown social emergencie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Governance Capacity; Sense of Social Security; COVID-19; Threshold Effect

一、问题的提出

近两年,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肺炎疫情在总体可控的情况下,仍在局部时有爆发,现代风险社会的“风险强度”加剧和“风险环境”扩张使得疫情场域下的恐慌情绪产生与传播存在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与此同时,新媒体时代网络舆情的扩散深刻牵动着人民群众的社会情绪与社会认知(郭未等,2020)。在这场人、环境、技术与社会的互动中,未知的恐慌和应激的焦虑成为了一种常态(丁汉青等,2020)。疫情期间,地方政府严防严控的封控政策使得公众在交通出行、生产劳动、医疗救治和食品药品购买等方面面临巨大困难。而与疫情相伴的各类不实谣言和网络社会舆论,频繁的核酸检测排查、疑似人员隔离和信息登记都深刻影响和刺激着公众对个人隐私、财产安全、生态环境和卫生环境等的敏感神经(谌丽等,2021)。安全需求作为基本的生存需求,事关公众切身利益,也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石。因此,对于政府而言,最大程度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需要,提升社会公众的社会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是推动和评价其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张延吉等,2017)。

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毋庸置疑,保障人民群众的切身安全得益于强大的政府治理能力建设。在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初期,武汉市每日确诊病例急剧攀升,疫情紧张氛围空前弥漫,民众人心惶惶。但如我们所见,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与有效组织下,在较短时期内,武汉市以及湖北省的疫情就逐步得到控制,经济迅速复苏,

社会秩序混乱情况迅速得到扭转，群众的恐慌心理和安全的焦灼也逐渐得到平复（Zhou et al., 2021）。与此同时，在世界多数国家仍苦陷于疫情的泥淖时，中国经济率先在世界范围内复苏，并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诸此可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疫情期间表现的强大组织能力和治理能力，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的安全需要，及时遏制了恐慌氛围的弥漫，是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重要保障。

但不可否认，政府在依托其强大的组织协调能力和管理控制能力使得疫情可防可控的同时，某些地方政府防控不力也导致了疫情在局部范围内时有反弹。一些官员的“背锅心理”使得地方发展出诸如堵路、“一刀切”式的拒绝劳务人员返乡等诸多不适宜的政策（李贺楼，2021），这严重影响了公众的身心健康和社会情绪，造成了群体的社会安全恐慌。可见，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与属地公众的社会安全感息息相关。基于社会认知视角研究人与环境互动的文献较多，但是在疫情的场域环境下，尚缺乏在人与环境互动的情景中纳入社会治理因素（政府治理能力），探索政府治理能力对公众社会安全感的潜在影响。离开疫情的场域环境谈当下公众的社会安全感势必落入主观臆想，而在这场人与环境的互动中，忽略政府强大的角色效应也是不合时宜的。因此，本文拟基于2020年7月至8月由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展开调查并获取的“湖北省疫后综合社会调查”数据（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on COVID-19 in Hubei, China）以及调查时段的湖北省各市的宏观统计年鉴数据，在构建合理指标体系对政府治理能力进行测度的基础上，探索政府治理能力对公众社会安全感的影响及其在城乡间的差异性。同时，本文还采用空间聚类分析探讨各市政府治理能力的空间分布格局、基于门槛效应模型探索政

府治理能力影响公众安全感的非线性特征。进一步，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修正。如此，本文便在社会认知理论框架内，一方面使得我们对政府治理能力如何影响公众安全感产生整体认知；另一方面，基于计量结果的政策建议也为政府的未来行动逻辑和政策制定提供应然指向。

二、概念、理论与研究假设

与本研究直接相关的核心概念是社会安全感。作为一种社会心态，社会安全感是人们对社会风险、社会服务以及社会治安等方面的主观认知和心理评价（Vail et al., 1999）。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安全感定义为“人对安全、秩序、稳定及免除恐惧、威胁与痛苦的需求”（马斯洛，2003）。王大为等（2002）的研究将社会安全感分为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前者包括生理要素、心理要素、个人境遇和自卫能力，后者囊括管理控制（治安管制）、违法犯罪和环境秩序三个方面。一些国内学者也以聚焦于某一方面诸如食品安全（吴林海等，2009）、社区安全（黄晴等，2021）、环境安全（Chung et al., 2011）等来开展社会安全感研究，但目前仍鲜有从综合角度来测度和研究公众社会安全感的文献。

在理论的维度之下，社会认知理论则架起了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安全感的逻辑桥梁，使得政府治理能力与社会安全感的关联性得到印证。社会认知理论范畴内的情境模型认为，人们在进行社会信息传递和理解社会信息的过程中构建了对事件的感知和理解，这种感知和理解指导着

他们后续的行为逻辑和观念逻辑 (Zwaan et al., 1998)。该理论模型的一个重要假设是“与情境模型理论有关的社会事件通常包括作为参与者或观察者自身, 即这些模型很有可能包含对描述事件的个人认知或情感方面的反应信息, 以及事件本身的特点” (王沛等, 2002)。逻辑而言, 作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工作、生活和学习——这种现实影响及其所营造的恐慌氛围刺激着人们作为新冠肺炎疫情经历者的社会心态、社会情绪和社会认知 (Zhou et al., 2021)。而微信、微博、QQ、豆瓣、B 站、抖音、快手等一大批自媒体、社交平台和短视频平台为这种社会情绪的表达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渠道。于是乎, 社会心态得以在网络场域呈现, 网络舆情成为现实社会心态的真实聚焦 (唐子茜等, 2015)。网络场域的形成, 使得新冠肺炎疫情的经历者面临现实环境和虚拟环境的双重影响, 即当人们以“自我”通过网络呈现焦虑的同时, “他者”的焦虑和事态的恐慌也必然会通过网络传递给这些人们。恰如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所说“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 深渊也在凝视你” (尼采, 2015)。公众对社会安全感自我判断, 不仅受其生活阅历、知识水平和历史经验的影响, 也受到大众传媒的深刻影响 (Neto et al., 2001)。在这种情境下, 人们对社会安全感的认知就不断被塑造。

网络社会空间的信息存在渲染, 传播和放大功能 (杨正等, 2020; Short, 1984), 因此, 政府行为更加透明地暴露在媒体聚光灯下。政府强有力的治理能力, 行之有效的组织能力, 以快捷有效的方法使得疫情得到有效控制, 推动经济复苏和社会秩序稳定, 这势必会极大增强人在与疫情环境互动中的安全感。而这种行之有效的政府作为, 不仅在

现实中能作为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和信心的镇定剂，而且会经过网络发酵形成网络场域的安全效应，会有效缓解人们的紧张、焦虑和恐慌。例如，上海的精准防疫经验不仅使得上海疫情防卫迅速得以结束，避免了更大生命安全和财产损失，也将恐慌情绪遏制在最小范围内。政府强有力的治理能力形成的安全信心的外部刺激，会显著影响人们的社会认知、情感和行为，进而表现出较高的社会安全感和社会信心（Bandura, 1999）。

与之相对，在重大疫情期间，治理能力低下的政府就可能依凭被赋予的更大的行政权力，在疫情防控政策及规定的出台方面出现采取“一刀切”和简单化的方式（孙道萃，2020），比如使得疫情防控变成堵路、封锁、严禁劳务人员返乡等等，这会在网络场域营造弥漫的恐慌氛围，诱发群众的不安全感。当下社会正步入网络化、信息化与智能化深度融合时代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陈云松等，2022），疫情之下的公众社会安全感实则与系统性的网络社会交织。互联网依凭其传播方式的迅捷性、传播内容的丰富性和易检索性使得“信息乘数效应”在虚拟场域爆发（雷跃捷等，2001）。横亘城乡间的“数字鸿沟”（侯为刚，2022）意味着城乡间信息扩散速度、广度和深度是不一致的。因此，虚拟和现实场域由政府治理能力所引致安全感和恐慌心理变化幅度同样存在差异性。已有研究则进一步证实媒体使用与公众安全感的密切关系（周博，2021）。当政府治理能力低下，疫情防控不当所引致的恐慌氛围在互联网的诱导和刺激下，在城市所引发的群体性恐慌和不安全感势必更为明显。反之，当政府治理能力完备，使得疫情短时间内可防可控。诸此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使得虚拟和现实场域的恐慌迅速得到遏制，城市民众

的社会安全感会得到更为显著的提升。

此外，相对于农村，城市具备人口规模大、人口流动性强、人口密集等特征，而乡村政府存在疫情信息掌控与传播能力不足（李全利等，2020），在公共服务、资源整合、风险防控、责任分担等诸多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场域环境的切换意味着政府治理能力对公众的社会安全感的影响在城乡间存在显著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1：政府治理能力对公众社会安全感存在显著正向作用。

假设 1.1：政府治理能力对公众社会安全感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

但是，政府治理能力对公众社会安全感影响可能是非线性的。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社会现代化转型大背景中进行的，就中国而言，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社会风险（包括社会安全感）的多重复合性（刘岩等，2011）。而现代风险的“主观建构性”（吉登斯，1998）则使得公众的经验和行为受制于那些当前不存在的、想象的和虚拟的风险。于是，当政府治理能力转型和现代化变革并轨而行时，就会给这种虚拟的风险提供想象空间。风险的复合性和不确定性使得政府治理能力对社会安全感的影响很可能是复杂的和非线性的（刘玮等，2016）。同时，在不同发展阶段，受到地区经济、社会、历史和地理的影响，政府治理呈现阶段性的演化特征。如柳亦博（2018）将历史发展进程中国家治理的阶段性演化分为疆域主义、生产主义、制度主义和行动主义。有学者（耿国阶等，2019；王郅强等，2020）进一步探索治理逻辑在营商环境、乡村治理等细分领域的时空演化。这种不同发展阶段治理逻辑的演变以及细分

领域治理逻辑的演化意味着不同时点政府治理能力及其着力点是不同的,这同样意味着政府治理能力对公众社会安全感的影响很可能是非线性的。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2: 政府治理能力对公众社会安全感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

三、数据与研究方法策略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包括两部分,基于问卷调查获取的公众社会安全感数据来自华中师范大学和湖北总工会于2020年7月底至8月初在湖北全省开展的“湖北省疫后综合社会调查”(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 on COVID-19 in Hubei, China)。^①该调查包括基础模块和心理健康、家庭关系和家庭生活、社会互动与经济行为、网络行为与社会心态四个专题模块。调查对象为湖北省全省城乡16-70周岁常住公众,包括本地常住户籍人口和外来常住流动人口。“湖北省疫后综合社会调查”收集到的有效样本量为25,465个。本文选取了其中的“网络行为与社会互动”模块专题数据,该专题包含5,993个有效样本。同时,本文在测度政府治理能力水平以及在后续回归分析时使用了大量湖北各地市的宏观数据,相应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21》、^②《湖北省统计年鉴2021》、湖北省各地市统计年鉴,

^①关于该项调查的更多介绍可参考(Zhou & Guo, 2021b)。

^②“湖北省疫后综合社会调查”于2020年进行,而统计年鉴一般在下一年份公布上一年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数据。

以及湖北省各地市人民政府、统计局和司法局的官网。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应对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时,本文利用湖北省各地市的经纬度坐标构建空间距离变量,相应数据来自于国家基础地理研究中心。^①

(二) 变量处理

1.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公众的社会安全感,“湖北省疫后综合社会调查”在借鉴已有成熟公众社会安全量表的基础上(王俊秀,2008;Vail,1999),从“财产安全、人身安全、交通出行、医疗救治、食品药品、生产劳动、个人隐私、生态环境、卫生环境”等9个维度衡量了公众的社会安全感。对于每个维度,均采用李克特量表形式,分为非常不安全、不太安全、一般、比较安全、非常安全五个维度进行评价,分别记为1分、2分、3分、4分和5分。考虑到量表内容的完整性,单一维度安全感的主观随意性,分不同维度来分析公众社会安全感的复杂性,以及疫情大环境都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上述9个维度的居民社会安全感。因此,本文对受访者上述9个维度的社会安全感加总,分数越高,表明受访者的总体社会安全感越高。同时,测度公众社会安全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0.9698,说明该量表具备良好的信度。

2. **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政府治理能力,对于政府治理能力的测度国内尚未有统一的标准。世界银行“世界治理指数”从

^①详情参见国家基础地理研究中心官网:<https://www.ngcc.cn/ngcc/html/1/index.html>。

话语权和问责、政治稳定与杜绝暴力、政府效能、规制质量、法治和遏制腐败六个方面衡量国家和地区的治理水平（程同顺等，2017）。在国内方面，李靖等（2020）从政治治理能力、经济治理能力、文化治理能力、社会治理能力和生态治理能力五个方面测度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马忠新（2022）从政府规模、公共服务能力、市场配置资源水平、进入服务能力和官员治理能力五个维度测度我国市级和县级城市的政府治理能力。何燕玲等（2014）从需求识别、服务供给、学习成长三个一级指标以及涵盖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交通、文化娱乐等 16 项二级指标对全国 19 个副省级城市政府能力进行评估。从以上文献的论述可以看出，政府治理能力不仅仅强调政府的管理能力，也强调政府的服务能力，这种服务能力则体现在政府在文化、经济以及民生方面的成效。借鉴上述政府治理能力指标体系，并在参考前人对政府治理能力的相关内涵界定（黄晓春等，2017；Acemoglu et al., 2015；Helliwell et al., 2008）的基础上，本文从城市活力、民生保障、政府绩效、法治建设和数字水平六个维度测度政府治理能力，各维度指标合理性解释如下：

1. 城市活力。本文从人均产出、教育水平和发明专利三个维度测度城市活力。城市活力直接反映城市的吸引力（Wu et al., 2018），影响公众的生活质量以及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王波等，2021）。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和创新能力不仅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高经济发展水平、高教育水平和高创新能力是直接体现政府在经济治理、文化治理和科技治理方面的成效。

2. 民生保障。本文从人均可支配收入、医疗卫生床位数和公共财政

支出三个维度测度民生保障。民生保障反映政府在社会民生治理领域的治理力度和成效，并直接影响公众的获得感（徐延辉等，2021）。这同时也与前述政府的服务供给能力相呼应，能较好反映政府治理能力水平。

3. 政府绩效。本文从行政效率、政府相对规模和行政廉洁三个维度测度政府绩效。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控制政府规模、提高政府服务水平是推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方向（高楠等，2015），也是提高和反映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而政府腐败不仅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直接的抑制作用（吴一平等，2010），同样影响政府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姜扬，2019），降低民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不利于政府治理能力的维护和提升。

4. 法治建设。本文从行政复议率、政务公开和司法公开三个维度测度政府法制建设水平。法治建设契合了政府依法治国的根本立场（唐伟尧，2022），也反映出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视制度理性的选择逻辑（衡霞，2021）。因此，法治建设是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是政府治理能力评估不可或缺的一环。

5. 数字水平。本文从移动用户数、互联网用户数、和数字社会指数三个维度测度数字水平。当下社会“数字革命”不仅在经济领域层层镶嵌，也深植社会治理领域结构重塑（徐顽强，2022），“数字化”推动和催生了当下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陈讯，2022）。因此，在政府治理能力测度中纳入政府数字水平能较好弥补当下对政府治理能力评价的系统性缺失问题。政府治理能力测度指标体系、指标衡量方法、指标单位和指标属性如表1所示：

表 1 政府治理能力测度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具体测度	单位	指标属性
城市活力	人均产出	人均 GDP	元	+
	教育水平	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	人	+
	发明专利	发明专利 / 各省人口总数	件 / 人	+
民生保障	可支配收入	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医疗水平	医疗卫生床位数	每千人	+
	公共支出	公共财政支出	亿元	+
政府绩效	行政效率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 公共财政收入	%	-
	政府相对规模	各地市人口数 /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就业人数	%	+
	行政廉洁	百度指数官员贪污关注度	-	-
法治建设	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申请案件数 / 行政复议受理案件数	%	+
	政务公开	政务信息发布量	条	+
	司法公开	司法信息发布量	条	+
数字水平	移动用户数	移动用户数	户	+
	互联网用户数	互联网用户数	户	+
	数字社会指数	腾讯数字中国指数 ^①	-	+

3. 疫情变量。考虑到“湖北省疫后综合社会调查”是基于疫情大背景下进行的社会专项调查，疫情相关因素势必会影响公众的社会安全感。已有研究也认为，公众安全感和社会结构和社会行为具有密切的联系（王大为等，2002）。本文与疫情相关的变量为“家人是否确诊新冠肺炎”和“亲友是否因新冠肺炎死亡”两个问题衡量。前者 0 表示家人未感染新冠肺炎，1 表示家人确诊新冠肺炎。后者 0 表示亲友未因新冠肺炎疫情死亡，1 表示亲友因新冠肺炎疫情死亡。

^①更多详细内容，参见腾讯研究院官方网站：<https://www.tisi.org/21326>。

4. 工具变量。在探讨政府治理能力影响居民社会安全感的因果链中，可能存在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从而使得基准回归难以得到一致性估计（陈云松等，2010）。基准回归中居民社会安全感是被模型所决定的，而居民社会安全感受到制度、环境等多重复杂因素的影响（周俊山等，2020）。实际上，受限于问卷调查数据和已有宏观数据的局限性，往往难以穷尽重要的解释变量，这种变量的遗漏会使得回归结果是有偏的。为了应对回归分析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借鉴已有研究（马忠新，2022），本文构建了“与省会城市距离”这一工具变量。在基于国家基础地理研究中心获得的地市的经纬度坐标的基础上，我们计算出湖北省各地市与省会城市的距离，并将相应数据匹配到“湖北省疫后综合社会调查”问卷当中。

工具变量的选择需要满足相关性和内生性原则。首先，地市级政府治理资源来源于省级政府的治理资源配置和省会政府治理资源的辐射（马忠新，2022），根据地理学衰减定律，与“省会城市距离”越近，则意味着获取的治理资源越少，两者满足相关性假定。其次，各地市与省会城市的距离是既定天然宏观因素，几乎不受各地市政府治理能力本身影响，工具变量和内生变量不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关系。而从理论上而言，作为宏观层次的各地市与省会城市的距离也很难影响微观层次的居民社会安全感知。因此，“与省会城市距离”这一工具变量一定程度满足外生性假设。最后，基于2SLS的内生检验结果发现：第一阶段F值显著，说明政府治理能力确实是内生的。而弱工具变量检验在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如此，基于逻辑分析和实证检验进一步证明了工具变量的合理性。

5. 其它控制变量。为增强研究的可信性，本文还控制了性别、年龄、户口、政治面貌、民族、教育水平、家庭收入等人口学变量和家庭变量。

同时为了探究年龄影响公众社会安全感是否存在倒 U 型关系，我们同时构建了年龄的平方项。各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疫情变量、工具变量和其它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N=5,993)

变量	类别 / 指标	平均值 / 百分比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公众社会安全感	-	33.308	8.556	9	45
核心解释变量					
政府治理能力	-	0.347	0.226	0.079	0.661
控制变量					
性别	男	61.05%	0.495	0	1
	女	38.95%			
年龄	-	30.981	9.331	16	70
政治面貌	党员	28.55%	0.448	0	1
	非党员	71.45%			
民族	汉族	94.98%	0.205	0	1
	少数民族	5.02%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11.30%	1.097	0	4
	高中或同等学力	25.88%			
	大专	22.78%			
	本科	34.71%			
	硕士及以上	5.34%			
家庭收入	0-5000 元	57.16%	0.659	0	3
	5000-10000 元	36.60%			
	10000-15000 元	4.75%			
	15000 元以上	1.50%			
户籍	农村户口	55.80%	0.497	0	1
	城市户口	44.20%			
本人或家人确诊	是	2.57%	0.237	0	1
	否	97.43%			
亲友去世	是	3.24%	0.120	0	1
	否	96.76%			
工具变量					
与省会距离	-	182.683	178.567	0	630.6

(三) 模型设置

1. 熵权 TOPSIS 法

本文采用“熵权 TOPSIS 法”测度湖北省各地市的政府治理能力。“熵权 TOPSIS 法”是具有优良性质的测度方法,兼具熵权法的客观性,又可避免熵权法极值对结果的影响(杨伟中等, 2020)。在这里,我们首先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其中,公式(1)处理正向指标,公式(2)处理负向指标。

$$Y_{ij} = \frac{X_{ij} - \min(.j)}{\max(.j) - \min(.j)} \quad (1)$$

$$Y_{ij} = \frac{\max(.j) - X_{ij}}{\max(.j) - \min(.j)} \quad (2)$$

其中, X_{ij} 表示湖北省各地市政府治理能力各项指标原始数据, Y_{ij} 是经过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数据, $\min(.j)$ 和 $\max(.j)$ 分别表示湖北省各地市政府治理能力指标体系 j 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其次,在各指标经过无量纲化处理后,仍然可能出现存在负值的情况,而熵权测度采取对数形式,不能出现负值,因此我们对无量纲化处理后数据进行非负化处理:

$$\beta_{ij} = Y_{ij} + \mu \quad (3)$$

μ 表示在 Y_{ij} 后加入一个非负常数,同时满足 $\mu > |\min(Y_{ij})|$ 。在对数据进行非负化处理后,根据熵权法计算步骤,需要进一步计算具体指标下某个对象的权重,具体形式如下:

$$\gamma_{ij} = \frac{\beta_{ij}}{\sum_1^n \beta_{ij}} (i=1,2,\dots,m; j=1,2,\dots,n) \quad (4)$$

m 表示湖北省各地市个数, j 为指标体系的指标个数, 并计算指标 j 的熵值:

$$I_j = -v \sum_{i=1}^n \gamma_{ij} \ln(\gamma_{ij}) \quad (5)$$

其中, $v = 1/\ln(m)$ 。 m 为湖北省各地市数, 此处 $m = 17$ 。

在公式 (5) 的基础上计算第 j 个指标差异系数为:

$$g_j = 1 - e_j \quad (6)$$

最后计算指标的权重为:

$$\omega_j = \frac{g_j}{\sum_{j=1}^n g_j} (j=1,2,\dots,n) \quad (8)$$

计算出 j 指标权重后, 令:

$$Z_{ij} = \gamma_{ij} \cdot \omega_j (i=1,2,\dots,m; j=1,2,\dots,n) \quad (9)$$

并计算正理想距离 D^+ 与负理想距离 D^- :

$$D^- = \sqrt{\sum_{j=1}^n (Z_{ij} - Z_j^-)^2} \quad (10)$$

$$D^+ = \sqrt{\sum_{j=1}^n (Z_{ij} - Z_j^+)^2} \quad (11)$$

最后, 根据正理想距离和负理想距离计算出湖北省各地市政府治理

能力评价与最优方案贴近程度:

$$C_i = \frac{D_i^-}{D_i^+ + D_i^-} \quad (12)$$

根据公式, C_i 的取值在 0-1 之间, C_i 值越大, 表明湖北省各地市政府治理能力的得分越高。

2. 工具变量法

为了应对政府治理能力影响公众社会安全感的计量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我们在传统的 OLS 模型基础上, 采用工具变量法 (2SLS) 做进一步估计, 模型设定如下:

$$y_i = \beta_0 + \beta_1 S_i + \beta_2 X_i + \varepsilon_i \quad (13)$$

$$S_i = \gamma_0 + \gamma_1 Z_i + \gamma_2 X_i + \zeta_i \quad (14)$$

其中, y_i 是因变量, S_i 是内生解释变量, X_i 是一系列控制变量, ε_i 是第二阶段随机误差项, Z_i 是工具变量, ζ_i 是第一阶段随机误差项。在公式 (14) 中, 其必须满足 $Cov(Z_i, \varepsilon_i) = 0$, $Cov(\zeta_i, \varepsilon_i) = 0$, 且 $Cov(Z_i, S_i) \neq 0$ 。因此, 工具变量回归在此的逻辑就是: 在第一阶段对公式 (14) 进行回归, 得到 S_i 的预测值 \hat{S}_i ; 在第二阶段, 将公式 (13) 里面的 S_i 用 \hat{S}_i 替代后进行回归, 得到无偏估计量。

3. 门槛效应模型

为了进一步探究不同水平的政府治理能力影响公众社会安全感是否存在异质性, 本文还采用门槛效应模型进行进一步的回归, 单门槛模型设定如下:

$$y_i = \zeta_1 gov_i I(gov_i \leq \eta) + \zeta_2 gov_i I(gov_i > \eta) + \gamma_1 X_i + \zeta_i \quad (15)$$

η 此处为门槛值, y_i 是因变量, 这里表示公众社会安全感, gov_i 为门槛变量, 这里表示政府治理能力。 X_i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I(\cdot)$ 为示性函数, η 表示门槛阈值。

四、结果分析

(一) 湖北省各地市政府治理能力评价及空间聚类分析

熵值法权重结果汇总如表 3 所示。同时, 我们基于“熵权 TOPSIS 法”对湖北省各地市政府治理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其结果如后续表 4 所示。

表 3 熵值法权重结果汇总

变量	信息熵值 e	信息效用值 d	权重系数 w
人均 GDP	0.9142	0.0858	3.77%
普通本专科在校学生数	0.6117	0.3883	17.05%
发明专利	0.6442	0.3558	15.62%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0.8594	0.1406	6.17%
农村居民收入	0.9318	0.0682	2.99%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0.9679	0.0321	1.41%
行政效率	0.7403	0.2597	11.40%
政府相对规模	0.9529	0.0471	2.07%
百度官员贪污指数	0.9794	0.0206	0.90%
行政复议率	0.9215	0.0785	3.45%
司法信息发布量	0.8793	0.1207	5.30%
政府信息发布量	0.8028	0.1972	8.66%
移动电话用户	0.8756	0.1244	5.46%
国际互联网用户	0.8955	0.1045	4.59%
腾讯数字中国指数	0.7457	0.2543	11.16%

由表 4 可知, 湖北省各地市政府治理能力水平基本呈现出量上“一超多强”的分布特征。省会城市武汉市的政府治理能力评分达到 0.661, 排名第一。在武汉市之后, 荆门市、恩施市、宜昌市、襄阳市和恩施市

政府治理能力分处 2-6 位，各地市的政府治理能力水平差异不大，其余地级市的政府治理能力水平得分则均处于较低水平。

表 4 熵权 TOPSIS 评价计算结果

地市	正理想解距离 D+	负理想解距离 D-	相对接近度 C	排序结果
武汉市	0.143	0.279	0.661	1
黄石市	0.288	0.058	0.169	10
十堰市	0.294	0.048	0.140	11
宜昌市	0.273	0.081	0.229	4
襄阳市	0.272	0.078	0.223	5
鄂州市	0.296	0.048	0.139	12
荆门市	0.275	0.121	0.305	2
孝感市	0.282	0.060	0.174	8
荆州市	0.286	0.064	0.182	7
黄冈市	0.288	0.075	0.206	6
咸宁市	0.298	0.061	0.171	9
随州市	0.306	0.035	0.102	15
恩施市	0.282	0.096	0.254	3
仙桃市	0.305	0.039	0.112	13
潜江市	0.307	0.038	0.111	14
天门市	0.311	0.028	0.082	16
神农架林区	0.309	0.026	0.079	17

我们在此进一步对湖北省各地市政府治理能力进行空间聚类分析。聚类方法采用 k-均值聚类方法，距离使用欧式距离，并采用 GeoDa（版本号 1.20）软件展示空间聚类分布。空间聚类综合考虑地理位置和政府治理能力属性的相似性，考虑区域类型的差异和均匀性，我们将政府治理能力分为三层：

第一层（政府治理能力水平高）：武汉市。

第二层（政府治理能力水平中等）：黄冈市、荆门市、襄阳市、宜昌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第三层（政府治理能力水平较低）：十堰市、神农架林区、随州市、

孝感市、天门市、潜江市、仙桃市、荆州市、咸宁市、黄石市、鄂州市。

同时，由图1可以发现政府治理能力存在空间上的异质分化特征。政府治理能力较强的地区集中在东部和西南部地区。这种空间的异质分化意味着湖北省在举全省之力应对诸如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事件过程中，在资源配置、调度、事态扼制和防控等方面将面临巨大挑战。



图1 湖北省各市政府治理能力的聚类空间分布^①

（二）湖北省疫后综合社会调查公众社会安全感描述性分析

由表5可知，湖北受访者疫后社会安全感最高为医疗救治，认为其“比较安全”和“非常安全”的受访者占比达61.47%。实际上，湖北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央从全国统筹调配资源，解决了湖北医务人员和医疗物质短缺问题，这大大增强了湖北的医疗防护力量，树立了湖北省群众的

^①图1中图例中的括号内数字表明属于该范围的地市个数。

医疗信心和抗疫决心。而 12.15% 的受访者认为社会安全中的个人隐私“非常不安全”和“不太安全”。湖北疫情期间,各级政府严格频繁的防控排查,信息登记,“健康码”和“行程码”上报,这可能极大刺激了受访者对个人隐私泄露的担忧。

表 5 湖北受访者疫后社会安全感的基本状况 (N=5, 993)

	百分比				
	非常不安全	不太安全	一般	比较安全	非常安全
财产安全	4.71%	5.69%	29.52%	33.96%	26.13%
人身安全	4.49%	5.64%	29.75%	32.27%	27.85%
交通出行	4.66%	5.49%	30.44%	33.61%	25.81%
医疗救治	4.34%	5.22%	28.97%	34.29%	27.18%
食品药品	4.62%	6.07%	31.47%	32.82%	25.01%
生产劳动	4.46%	5.04%	30.14%	34.07%	26.30%
个人隐私	5.11%	7.04%	31.05%	31.67%	25.13%
生态环境	4.59%	6.09%	32.10%	32.29%	24.93%
卫生环境	4.64%	5.89%	30.65%	33.14%	25.68%

(三) 政府治理能力是否影响公众社会安全感?

由表 6 中的模型 1 的结果可知,政府治理能力显著促进了居民社会安全感。保持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政府治理能力每增加 1 个单位,平均而言公众社会安全感将会增加 0.528 单位,研究假设 1 成立。政府治理能力水平的提高,可以在最短时间内防控和遏制疫情扩张,使得经济社会恢复到平稳运行状态,增强群众的安全信心和抗疫决心。为了应对模型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本文使用加权最小二乘估(WLS)计进行进一步估计。由模型 2 可知,政府治理能力仍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公众社会安全感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影响系数有明显的下降。政府治理能力每增加 1 单位,公众社会安全感将会增加 0.455 单位。我们进一步对城

市和农村进行分样本回归，可以发现农村的政府治理能力对公众安全感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这与我们的认知不符，但这有可能是因为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问题引致估计偏误。基于这种思考，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对政府治理能力影响公众社会安全感可能存在的内生性进行检验和修正。

采用工具变量法对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修正，由模型 5、模型 6 和模型 7 可以看出，第一阶段 F 值均在 1%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检验结果同样表明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同时所选取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从修正后的结果可以看出，全样本和各分样本中，政府治理能力对公众社会安全感的影响系数有了显著提高。全样本而言，政府治理能力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公众社会安全感的提升。控制其它变量不变，政府治理能力水平每上升一个单位，公众社会安全感上升 1.247 单位，相应城市公众社会安全感上升 1.361 单位，农村公众社会安全感上升 0.655 单位（10% 显著性水平上），假设 1 和假设 1.1 均成立。城市相对于农村所具备的独特性，意味着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对城市公众社会安全感影响的边际效应更大。

此外，我们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公众社会安全感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 U 型曲线。全样本的拐点在 41 岁，农村的拐点在 36 岁，城市的拐点在 44 岁。城市公众社会安全感的峰值要比农村公众社会安全感峰值晚 8 年到来。这也意味着中壮年群体的公众社会安全感知较高，而如何应对“一老一小”（高龄化老人和低龄化青少年）的公众社会安全感焦虑以及由此引发的身心健康问题值得关注。同时，本文在此处的回归结果表明，女性、高学历、高收入群体的社会安全感较高。这就不得不使我们反思，在后疫情时代，随着整体而言的低学历、低收入的劳工群体大规模返回城市后，政府该如何解决这类弱势群体的社会安全感缺失问题。

表 6 基准回归与工具变量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OLS- 全样本	WLS- 全样本	OLS- 城市	OLS- 农村	2SLS- 全样本	2SLS- 城市	2SLS- 农村
政府因素							
政府治理能力	0.528** (0.226)	0.455** (0.194)	0.736** (0.303)	-0.202† (0.102)	1.247** (0.591)	1.361** (0.597)	0.655† (0.329)
个体因素							
性别 (男性=0)	1.209*** (0.240)	1.386*** (0.240)	1.234*** (0.276)	0.899† (0.457)	1.216*** (0.244)	1.241*** (0.282)	0.905† (0.478)
年龄	0.516*** (0.082)	0.584*** (0.073)	0.433*** (0.092)	0.724*** (0.168)	0.520*** (0.076)	0.434*** (0.089)	0.733*** (0.145)
年龄平方	-0.006*** (0.001)	-0.007*** (0.001)	-0.005*** (0.001)	-0.010*** (0.003)	-0.006*** (0.001)	-0.005*** (0.001)	-0.010*** (0.002)
户口 (农业户口=0)	0.325 (0.246)	0.293 (0.241)	0.564** (0.277)	-0.830 (0.631)	0.327 (0.246)	0.571** (0.277)	-0.818 (0.627)
政治面貌 (0=非党员)	-0.127 (0.279)	-0.652** (0.266)	-0.073 (0.301)	-0.037 (0.756)	-0.129 (0.267)	-0.076 (0.291)	-0.001 (0.696)
民族 (0=汉族)	-0.781 (0.593)	-0.395 (0.508)	-1.333* (0.697)	0.532 (1.109)	-0.735 (0.548)	-1.288* (0.667)	0.563 (0.949)
教育水平(0=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同等学力	1.770*** (0.481)	1.557*** (0.419)	2.356*** (0.638)	0.993 (0.724)	1.775*** (0.434)	2.358*** (0.563)	1.003 (0.672)
大专	2.258*** (0.489)	1.984*** (0.432)	3.022*** (0.631)	0.916 (0.806)	2.257*** (0.448)	3.021*** (0.564)	0.928 (0.769)
本科	2.681*** (0.486)	2.556*** (0.431)	3.473*** (0.624)	1.283 (0.817)	2.655*** (0.441)	3.454*** (0.551)	1.253 (0.797)
硕士及以上	1.994** (0.718)	1.870*** (0.676)	2.755*** (0.828)	0.436 (2.018)	1.957** (0.653)	2.724*** (0.741)	0.422 (1.886)
家庭收入							
(0=5000 元以下)							
5000 元 -10000 元	1.204*** (0.266)	-3.052*** (0.443)	1.335*** (0.296)	0.890 (0.635)	1.195*** (0.264)	1.331*** (0.295)	0.885 (0.613)
10000 元 -15000 元	2.016*** (0.527)	3.984*** (1.084)	2.052*** (0.576)	2.270† (1.336)	1.965*** (0.555)	2.006*** (0.598)	2.267 (1.554)
>15000 元	1.082 (1.083)	19.977*** (1.196)	1.652 (1.091)	-5.376 (5.451)	1.026 (0.916)	1.609* (0.957)	-5.458 (3.396)
疫情因素							
家人是否确诊 (0=否)	-3.092*** (0.441)	-3.052*** (0.443)	-2.983*** (0.491)	-3.569*** (1.026)	-3.078*** (0.457)	-2.959*** (0.512)	-3.607*** (1.020)
亲友是否死亡 (0=否)	3.458*** (0.947)	3.984*** (1.084)	3.100*** (1.080)	5.280** (2.009)	3.476** (1.163)	3.121** (1.302)	5.290* (2.592)
常数项	20.778*** (1.357)	19.977*** (1.196)	20.852*** (1.560)	19.968*** (2.637)	20.471*** (1.241)	20.603*** (1.457)	19.522*** (2.420)
倒 U 型检验 t 值	4.07***		2.60*	3.36***			
倒 U 型拐点	41.205		44.603	36.150			
第 1 阶段 F 值					354.36***	291.40***	63.88***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Wu-Hausman F 检验					15.24***	17.87***	13.69***
弱工具变量检验					5344.52***	4402.98***	934941***
R2	0.065	0.069	0.073	0.056	0.065	0.073	0.056
样本量	5126	5126	3947	1179	5126	3947	1179

注：† 表示 $p < 0.1$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01$ 。
括号内为标准误。

(四) 政府治理能力影响公众社会安全感是否具备门槛效应?

由表 7 和表 8 的模型 8、模型 9，我们可以看出政府治理能力影响公众社会安全感存在明显的双门槛效应。当政府治理能力小于 0.155 时，在控制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政府治理能力每提升 1 个单位，公众社会安全感将会增加 6.415 个单位。当政府治理能力大于 0.155 时，政府治理能力每增加 1 单位，公众社会安全感增加 0.1333 单位。整体而言，政府治理能力在达到临界值后对公众社会安全感影响的边际效应明显下降，研究假设 2 成立。

进一步考虑农村和城市的分样本情况，由表 7 和表 8 模型 10、模型 11 可以看出，对城市公众而言。当政府治理能力小于 0.155 时，在控制其它变量不变的条件下，政府治理能力每提升 1 个单位，公众社会安全感将会增加 6.567 单位。当政府治理能力大于 0.155 时，政府治理能力每增加 1 单位，公众社会安全感增加 2.041 单位，政府治理能力的影晌效果明显下降，这与全样本呈现类似特征。

由表 7 和表 8 模型 12、模型 15 可以看出，对于农村样本而言，政府治理能力对公众社会安全感知影响不存在门槛效应。门槛回归结果也说明这种影响是不显著的。结合对于总体样本和城市样本的门槛效应分析，可以发现整体而言，政府治理能力对城市公众社会安全感知的影响更大。

表 7 门限效应检验结果

	门限检验	门槛值	F 值	P 值	95% 置信区间
全样本	单门槛	0.155	6.103**	0.013	[0.140,0.229]
城市	单门槛	0.155	3.997*	0.100	[0.140,0.305]
农村	单门槛	0.152	0.109	0.787	[0.140,0.229]

但是, 结合本文对湖北省各地市的政府治理能力评价可知, 对于政府治理能力在 0.155 以下的城市而言, 快速提升政府治理能力能在未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提升公众社会安全感具有重要作用。而对于那些治理能力较高的城市而言, 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对居民社会安全感影响虽然有明显的下降, 这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幅度和效度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未来, 持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有效应对诸如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突发事件, 并因此提升公众社会安全感等工作仍有较大空间可为。坚定不移的推动经济发展、保障民生建设、提升政府绩效、推动发展建设、提升数字治理水平是全面综合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可行之举。

表 8 门槛效应回归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全样本		城市		农村	
变量	政府治理能力 ≤0.155	0.155 (政府 治理能力)	政府治理能力 ≤0.155	0.155< 政府治 理能力	政府治理能力 ≤0.152	0.152< 政府治 理能力
政府因素						
政府治理能力	6.415** (2.48)	1.333* (0.64)	6.567** (2.82)	2.041** (0.75)	-2.221 (5.93)	-0.810 (1.92)
常数项	20.560*** (1.21)		21.750*** (1.30)		20.123*** 2.58	
样本量	5126		3947		117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注: †表示 $p < 0.1$; *表示 $p < 0.05$; **表示 $p < 0.01$; ***表示 $p < 0.001$ 。括号内为标准误(截面门槛回归采用 `crosstn` 命令, 该命令对标准误仅保留两位小数)。

五、结论与讨论

保障人民群众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宗旨。^①作为一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新冠肺炎疫情，其对政府治理能力是一次巨大考验。而在这场政府组织协调、各方众志成城的抗疫决战中，社会环境深刻影响和塑造了公众的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王俊秀等，2019）。我们的研究发现，公众社会安全呈现出显著的群体异质性，中年、女性、高收入高学历群体的公众社会安全感较高。因此，如何解决“一老一小”（高龄化老人和低龄化青少年）和“低收入、低学历”为主要特征的劳工群体社会安全感缺失问题，应当成为未来政策关注的方向。

湖北省各地市政府的治理能力呈现出量上的“一超多强”和空间上的异质分化格局。作为省会城市的武汉市的政府治理能力要明显高于其它地市，湖北省的东部和西南部的政府治理能力要明显高于湖北省其它地区。这种政府治理力量上的差异和空间上的分化意味着空间的组织协调面临较大挑战，当在风险社会发生其他的类似于新冠肺炎的突发性事件时，类似的矛盾会更加突出，防控难度也将大大增加。

政府所具备的强大治理能力，使得政府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时能更有效的组织资源，更迅速的遏制疫情，更有力的复苏经济和稳定社会秩序。而在疫情的大环境下，政府和个人的互动深刻影响个人的社会情绪和社

^①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宗旨，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国家利益至上是国家安全的准则”。

会认知。政府的高效能提升公众的社会安全信心，也成为公众社会安全感的有力保障。但是相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城市具备人口规模大、人口流动迅速，人口密集等特征。这意味行之有效的强大政府治理能力对于城市公众的社会安全感提升具备更大的边际效应。

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置身于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之中，而现代化充满复杂交织的现代风险。这意味着政府治理能力对公众社会安全的影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基于门槛效应的回归结果，我们发现，随着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在门槛值前后均对公众社会安全感知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但是政府治理能力在突破门槛阈值时，这种正向作用有所减弱。这揭示着打造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现代化转型仍存在较大的空间，同时对政府治理能力较高的城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及面临更大的挑战。坚定不移的推动经济发展、保障民生建设、提升政府绩效、推动发展建设、提升数字治理水平是全面综合提升政府的治理能力可行之举。同时，这种变化的影响仍旧呈现出对城市公众的社会安全感提升边际效应大于农村地区公众社会安全感提升的边际效应。即相对于农村地区，政府提升城市的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会取得更好的预期效果。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其一，受到疫情大环境影响，疫后综合社会调查的窗口期不断缩短。最终“湖北省疫后综合社会调查”选择非严格随机抽样的方式在线上进行，因此，问卷的代表性和问卷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这也对本文的分析结果造成一定的影响。其二，受限于地市数据的可得性，政府治理能力水平测度指标体系仍难以做到尽善尽美，未来在更完整数据可得基础上进一步丰富研究具备潜在的意义和价值。其三，武汉及湖北作为中国内地疫情率先爆发的地区，其疫情防控具备

特殊性。疫情防控效果并非只是体现了湖北省以及湖北省各地市的政府治理能力，武汉市以及湖北省的疫情防控是举全国之力、协调各方资源的防控。这会使得各地市政府治理能力防控效果的差异一定程度被遮蔽，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文章的分析结果。

纵然存在以上不足，本文在以下方面仍具备一定意义上的学术与政策贡献。其一，基于在疫情期间的宝贵的较大样本的调查数据，我们从社会认知理论出发，在疫情大环境背景下揭示了政府与个人互动过程对后疫情时代公众社会安全感的直观印象。其二，我们的研究解释了政府治理能力影响公众社会安全感的非线性特征，这既是对现代风险理论的经验补充，也指出了打造服务型政府，促进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的政策意涵。最后，本文涉足以往研究较少涉猎的政府治理能力和社会认知互动内容探究，这为进一步探讨政府和社会心态、社会认知的互动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

参考文献

- 安东尼·吉登斯(1998).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出版社. (原著出版于1991年)
- 陈讯(2022). 数字化普及、大数据应用与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贵州社会科学, (01), 128-134.
- 陈云松、范晓光(2010). 社会学定量分析中的内生性问题——测估社会互动的因果效应研究综述. 社会, 30(04), 91-117.
- 陈云松、郭未(2022). 元宇宙的社会学议题: 平行社会的理论视野与实证向度. 江苏社会科学, (02), 138-146+243.
- 谌丽、许婧雪、张文忠、解扬洋、党云晓、湛东升(2021). 居民城市公共安全感知与社区环境——基于北京大规模调查问卷的分析. 地理学报, 76(08), 1939-1950.
- 程同顺、李畅(2017). 世界银行“世界治理指数”对中国的测量与启示. 理论探讨, (05), 13-20.
- 丁汉青、苗勃、王军(2020). 行为与环境: 新冠肺炎疫情议题认知影响因素研究. 当代传播, (05), 28-33.
- 高楠、梁平汉(2015). 为什么政府机构越来越膨胀?——部门利益分化的视角. 经济研究, 50(09), 30-43.
- 耿国阶、王亚群(2019). 城乡关系视角下乡村治理演变的逻辑: 1949~2019. 中国农村观察, (06), 19-31.
- 郭未、沈晖(2020).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网络社会心态: 一个整合分析框架.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1(12), 157-164.
- 何艳玲、郑文强(2014). “回应市民需求”: 城市政府能力评估的核心.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5(06), 56-65.

- 衡霞 (2021). 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公共选择逻辑——基于 15 个省份 150 份政策文本的分析. 探索, (04), 38-48+2.
- 侯为刚 (2022 年 6 月). 媒体使用影响公众的安全感吗?——以大学生网民为对象的实证研究. 情报杂志, 1-9.
- 黄晴、徐雅静 (2021). 社区安全感与居民幸福感研究. 山东社会科学, (06), 72-79.
- 黄晓春、周黎安 (2017). 政府治理机制转型与社会组织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 (11), 118-138+206-207.
- 姜扬 (2019). 地方政府质量与民生性财政支出效率. 中国行政管理, (03), 133-139.
- 雷跃捷、金梦玉、吴风 (2001). 互联网媒体的概念、传播特性、现状及其发展前景. 现代传播 - 北京广播学院学报, (01), 97-101.
- 李贺楼 (2021). 基层官员的背锅风险由何而来——聚焦于基层特种设备安全监管的研究. 公共管理学报, 18(01), 45-54+169.
- 李靖、李春生、董伟玮 (2020). 我国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评估及其优化——基于吉林省的实证研究.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60(04), 62-72.
- 李全利、周超 (2020). 4R 危机管理理论视域下基层政府的危机应急短板及防控能力提升——以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为例. 理论月刊, (09), 73-80.
- 刘玮、张梦雨、康思敏 (2016). 动物疫情公共危机防控中多元主体行为研究——基于 CAS 范式.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9(06), 13-18.
- 刘岩、赵延东 (2011). 转型社会下的多重复合性风险——三城市公众风险感知状况的调查分析. 社会, 31(04), 175-194.
- 柳亦博 (2018). 国家治理的阶段性演化: 一个贯通的政治学模型. 中国

- 人民大学学报, 32(02), 132-142.
- 马斯洛 (2003). 马斯洛人本哲学 (成明译). 北京: 九州出版社.
- 马忠新 (2022). 善治兴业: 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研究. 当代经济管理, 44(01), 19-26.
- 尼采 (2015). 善恶的彼岸 (赵千帆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原著出版于 1886 年).
- 孙道萃 (2020). 刑法积极应对疫情防控的治理进阶.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2(03), 32-44.
- 唐伟尧 (2022). 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立场. 红旗文稿, (10), 33-35.
- 唐子茜、曹勇 (2015). 网络社会心态的特征及调适对策.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4(01), 132-136.
- 王波、甄峰、张姗姗、黄学锋、周亮 (2021). 空气污染对城市活力的影响及其建成环境异质性——基于大数据分析. 地理研究, 40(07), 1935-1948.
- 王大为、张潘仕、王俊秀 (2002). 中国居民社会安全感调查. 统计研究, (09), 23-29.
- 王俊秀、刘晓柳 (2019). 现状、变化和相互关系: 安全感、获得感与幸福感及其提升路径. 江苏社会科学, (01), 41-49+258.
- 王俊秀 (2008). 面对风险: 公众安全感研究. 社会, (04), 206-221.
- 王沛、林崇德 (2002). 社会认知的理论模型综述. 心理科学, (01), 73-75.
- 王郅强、王凡凡 (2020). 治理视角下营商环境优化的演变逻辑——基于佛山市的考察. 中国行政管理, (06), 30-36.
- 吴林海、徐玲玲 (2009). 食品安全: 风险感知和消费者行为——基于江苏省消费者的调查分析. 消费经济, 25(02), 42-44.

- 吴一平、芮萌 (2010). 地区腐败、市场化与中国经济增长. *管理世界*, (11), 10-17.
- 徐顽强 (2022). 数字化转型嵌入社会治理的场景重塑与价值边界. *求索*, (02), 124-132.
- 徐延辉、李志滨 (2021). 社会质量与城市居民的获得感研究.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04), 169-181.
- 杨伟中、余剑、李康 (2020). 金融资源配置、技术进步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研究*, (12), 75-94.
- 杨正、田进 (2020). 网络社会心态研究: 议题、场景与对策. *重庆社会科学*, (06), 123-133.
- 张延吉、秦波、唐杰 (2017). 城市建成环境对居住安全感的影响——基于全国 278 个城市社区的实证分析. *地理科学*, 37(09), 1318-1325.
- 周博 (2021). 人口流动背景下的中国城乡“数字鸿沟”. *求索*, (06), 112-120.
- 周俊山、尹银 (2020). 城市化对居民安全感的影响. *城市发展研究*, 27(04), 14-20.
- Acemoglu, D., García-Jimeno, C., & Robinson, J. A. (2015). State capac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network approac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08), 2364-2409.
- Bandura, A. (1999).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n agentic perspective.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 21-41.
- Chung, I. J. (2011).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 in the Internet environment. *Risk Analysi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2), 1883-1896.
- Helliwell, J. F., & Huang, H. (2008). How's your government? *International*

- evidence linking good government and well-being.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04), 595-619.
- Neto, F., & Mullet, E. (2001). Societal risks as seen by Chinese students living in Macao.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01), 63-73.
- Short, J. F. (1984). The social fabric at risk: Toward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risk analysi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06), 711-725.
- Vail J J . (1999). Insecure times: conceptualising insecurity and security. *Newcastle University*.
- Vail, J., J. Wheelock, & M. Hill (eds). (1999). *Insecure Times: Living with Insecurity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Wu, C., Ye, X., Ren, F., & Du, Q. (2018). Check-in behaviour and spatio-temporal vibrancy: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in Shenzhen, China. *Cities*, 77, 104-116.
- Zhou, M., & Guo, W. (2021a). Social factors and worry associated with COVID-19: Evidence from a large survey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77), 113934.
- Zhou, M., & Guo, W. (2021b). Subjective distress about COVID-19 and its social correlate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Hubei province of China.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89), 46-54.
- Zwaan, R. A., & Radvansky, G. A. (1998). Situation models in language comprehension and memor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02), 162-185.